

「重寫文學史」的方法論啟迪

● 陳建華



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藤井省三先生的《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以下簡稱《閱讀史》，引用只註頁碼）是一本構思靈巧、求證嚴密的專著，既有理論的宏觀構架，又提供大量新材料，體現了「以小見大」

的學術風範。「靈巧」不等於輕便，此書所帶來的閱讀之旅，不是觀光團的那種，預先把景點和行程交代清楚。讀者被置於一個新的視點，進入複雜的「意義」場域，從文本的生產、流通到批評，從讀者市場到學校課堂，貫穿多重文學與社會空間，所經之處猶如豐林長堤、高山大川，卻峰迴路轉，別見園林台榭、層樓密室。然而從方法論的層面說，讀者還得別具會心，才能找到開啟此書堂奧的鎖匙。

關於魯迅的研究汗牛充棟，何止百千。自1980年代末以來「重寫文學史」蔚成文學研究新潮，隨著「正典」的消解，多少「革命」經典作家淡出，而魯迅仍巍然屹立。即使被請下神座，其作品仍一再激起詮釋的熱情，與當下的「問題意識」相激蕩。與眾不同的是，藤井僅集中討論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從它1921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之日起，追蹤其流傳和閱讀的歷史軌迹，一直到1980年代。我們可看到，無論風雲突變，政權輪替，它始終是中學教科書的「超穩定」教材。為何《故鄉》能經久不衰？它對於文學空間的形塑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多

藤井省三集中討論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從它1921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之日起，追蹤其流傳和閱讀的歷史軌迹，一直到1980年代。無論風雲突變，政權輪替，它始終是中學教科書的「超穩定」教材。

《閱讀史》顧名思義，以閱讀受眾為主，考察作品的流通過程中思想、政治、印刷、教育等等各種機制如何運作於意義的衍生。這對於文學史寫作來說，是一種視角和論述方式的轉型。

重文學空間與現代中國的「想像共同體」有甚麼關聯？文學空間中的閱讀形態是怎樣的？各種閱讀經驗背後存在怎樣的意識形態機制？《閱讀史》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論述。

藤井在書中指出：「民國時期二十八年間《故鄉》被閱讀的歷史，就是『五四』時期確立的知識階級的國民國家意識形態轉換為以共產黨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之工具、改變機能與性質的歷史。」（頁85）「隨着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毛澤東時代的到來，對《故鄉》的閱讀受到了階級論視角的控制。不過，進入鄧小平時代之後，《故鄉》又開始被閱讀為知識份子（而非知識階級）以及『母親』、楊二嫂等小市民的故事。」（頁173）這些論斷令人信服，且使我們不無驚訝地看到，僅是一篇小說卻披着永不消褪的經典的光環，其閱讀命運與時代風雲的變化息息相關；作為中學教材，尤其對於少年心靈的塑造起作用，當然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及其意識形態的傳播方面也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

從魯迅作品中選擇《故鄉》作為論述中心，蘊含作者的一番匠心。這篇小說特別帶有自傳的抒情意味，首先勾起筆者的閱讀經驗——正值善感的青春期，一開頭就被那種悲涼的口吻所抓住，好像自己也有很多話要說。自小生長於城市，對於「故鄉」實際上頗為陌生。對閩土的麻木、豆腐西施的「圓規」留下深刻印象。雖然難以體會小說的深意，卻為作者濃重悲涼的情緒所感染。最末一段「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更是朗朗上口，回味無窮。

對於中國現代文學不斷「革命」，貫穿着「感時憂國」的主旋律，我們耳熟能詳。其中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激烈衝突，潛藏着鄉土與都市之間對抗的再現模式，前者純樸，後者罪惡，寄託着革命烏托邦的理想，與「農村包圍城市」的政治策略有異曲同工之處。但魯迅的這篇小說通過個人的見證，慨嘆「故鄉」與現代之間的「隔閡」，另具一種曖昧性；也可看作有關現代或文學困境的寓言，「故鄉」成為美麗、頹敗而永難挽回的「過去」，卻在我們的閱讀記憶裏久久回蕩。正是與個人、集體的歷史感受相聯繫，在《閱讀史》中「故鄉」成為「小說中國」的隱喻，更與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的理論架構互為指涉，遂重構了具有豐富歷史涵意的文學空間。

《閱讀史》與一般的文學史書寫不一樣。文學史一般以作家和作品為中心，由作品出發，探索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及其內心世界，但《閱讀史》顧名思義，則以閱讀受眾為主，考察作品的流通過程中思想、政治、印刷、教育等等各種機制如何運作於意義的衍生。這對於文學史寫作來說，是一種視角和論述方式的轉型。迄今為止，高等院校裏的文學史教育主要是通過對優秀作家及其風格的體認，使學生在陶情怡性之中潛移默化其觀念和美感，達到認同於主流價值的目的。考察「閱讀史」則在於揭示經典生成的歷史建構以及文本意義的相對性，更着意於培養學生的分析和反思能力，似乎與當下多元文化的走向更為合拍。

在現下歐美人文學界，「閱讀史」研究是一個亮點。理論上它淵源於1960年代德國學界興起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通過堯斯(Hans R. Jauss)等人於1970至80年代流行於美國，意謂任何類型的文本在其被接受過程中，讀者基於自己的文化構成而進行主動的詮釋。後來在法國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第四代傳人夏蒂耶(Roger Chartier)那裏，對於文本及意義生產過程的考察更趨精細複雜。他認為「接受理論」忽視了文本的各種出版形式，即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所擔任的中介環節，與作者的寫作意圖之間存在裂隙，而對讀者另具閱讀導向。夏氏對「閱讀史」的考察在於揭示閱讀的「歷史性」，即不同時期的文本生產方式，而讀者群由年齡、階層、教育背景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閱讀內涵。「閱讀史」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與社會底層、文化生產以及再現虛實等方面的考察一起，構成夏氏的「新文化史」的有機部分。

藤井的《閱讀史》論述《故鄉》如何在1921年最初出現於《新青年》雜誌、後被魯迅收入小說集《吶喊》中、又進入各種國語教科書的過程，正是圍繞着不同「媒介」重構了「閱讀史」。一面是民國政府推行語言改革運動，下令教育系統把「國文」改為「國語」，文言文小學教科書相繼改為白話文；另一面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推波助瀾，使白話文登上舞台中心，其間捲入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各出版社之間的教科書「商戰」，也引發「新」、「舊」文學觀念的衝突等，立體地描繪出極其豐富的歷史脈絡，由此也說明「新

文學」雜誌及報紙副刊如何風起雲湧、勢如破竹地拓展了新讀者群，而語言、印刷資本成功地發揮了「想像共同體」的效能。

似乎很自然的，由於視點的轉移，《閱讀史》更注重普通讀者的閱讀經驗，如歐陽凡海、徐漢安等，往往是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這樣的資料搜索如大海撈針，而令人深具印象的是，作者大力挖掘了1949年之後大量中學教師參考手冊之類的材料，仔細分析了學生在課堂中的閱讀經驗，而對於閨土、楊二嫂的紛紜理解和爭論，也顯示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意識形態差異。《閱讀史》對於資料掌握鉅細無遺，這也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日本學者的優良傳統。

書中第二章的「事實的文學與情感的文學」一節討論了文學批評中不同群體的閱讀傾向，涉及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課題。1920年代對於《故鄉》的「讀法」頗看重其情感或抒情的因素，然而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後，文學走向政治化，在新文學內部發生「革命文學」的論戰，如錢杏邨等對於魯迅的批評，象徵地意味着對於「傷感主義」的清算。同樣在「左翼」批評中，《故鄉》中情感的層面被「完全捨棄了」，而被當作「描寫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壓迫下悲慘的農村生活的現實主義小說來重新閱讀」(頁74)。所謂「事實的文學」幾與「現實主義」為同義詞，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已有大量研究，但很少聯繫到「情感的文學」加以討論。筆者以為，藤井提出的這一點頗富卓見，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而最近王

《閱讀史》論述《故鄉》如何在1921年最初出現於《新青年》、後被魯迅收入小說集《吶喊》中、又進入各種國語教科書的過程，正是圍繞着不同「媒介」重構了「閱讀史」。

《閱讀史》具體結合中國歷史場景，深入探討語言、印刷資本主義與讀者市場之間的關係，反過來豐富了一般對安德遜「想像共同體」的理解。

德威、陳國球等學者正大力從事中國抒情文學傳統的研究，也與現代文學有關。

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不乏運用安德遜「想像共同體」的理論，所謂「國族想像」更是常見的表述。這給現代報章和小說在建構民族國家的功能方面帶來了新的認識，也開啟了印刷媒體與文學空間想像的論述，而《閱讀史》具體結合中國歷史場景，深入探討語言、印刷資本主義與讀者市場之間的關係，反過來豐富了一般對「想像共同體」的理解。這使筆者聯想到近來現代文學研究中運用外來理論的狀況，比方說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公共領域」的理論也常為學者引用，一般用來討論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都市文化。

這兩種理論各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一方面，安德遜的「想像共同體」可說是後現代空間話語的產物，強調各民族主體及其文化認同，追溯其經久不衰的身份記憶，近徵於十九世紀以來世界範圍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經驗，足見全球化時代「歷史終結」的神話過於樂觀。由此印證二十世紀中國對於獨立民族國家的追求，以及在論述與之密切聯繫的「五四」式「宏偉敘事」方面，頗具成效。

另一方面，哈貝馬斯在論述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主義爭取自己的權益時，指出「公共領域」起到傳播啟蒙理念及凝聚社會力量的重要作用。雖然在近現代中國是否有「公共領域」引起學者的爭論，但在新興的近現代中國都市研究或「上海學」中常見「公

共空間」的論述，對哈貝馬斯的理論作了某種調適，這對於探討民國時期印刷文化與資產階級的「另一種啟蒙」、都市日常生活與現代性機制方面來說，也順理成章。

《閱讀史》中有一處可資討論的是，在論及1920年代初「進入『五四』時期之後，鴛鴦蝴蝶派進入衰退期，刊物相繼停刊。……隨着知識份子向北京的集中，閱讀重心也發生了從鴛鴦蝴蝶派轉向『五四』新文學、從上海文壇轉向北京文化界的質變」(頁26)。的確，由於五四新文學含有明確的「救亡」訴求，在意識形態上一向居主流地位，這並無異議。但由此說鴛鴦蝴蝶派刊物「相繼停刊」並不確切。恰在1921年，《禮拜六》、《半月》、《快活》、《遊戲世界》等雜誌紛紛重刊或創刊，而後世界書局的《紅雜誌》、《紅玫瑰》流行於幾乎整個1920年代。這期間「五四」和「鴛鴦」之間的爭論也未嘗消歇，以致在1930年代初魯迅還呼籲同仁要繼續同鴛鴦派作鬥爭。

《閱讀史》中這一論斷是可以理解的，該書1997年在日本出版，其時中國大陸學界對於鴛鴦派的研究，到2000年范伯群先生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出版才形成氣候。同一年李歐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中譯本見世，也為相對於五四的都市文化的「另一種啟蒙」作了理論化的表述。其實自1980年代末以反思「正典」為主旨的「重寫文學史」提出以來，隨着

「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不斷挖掘，現代文學的地圖不斷被重繪，而歷史愈接近其本相。

歷史的鐘擺在「革命」與「現代性」的兩端來回，既激起陣陣救亡的巨浪，為建立民族國家的主體前赴後繼，不惜犧牲，同時以都市為中心發展着消費社會和物質文化，也曾有過昔日的輝煌。換言之，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卻累積了資本主義的經驗，稱之為「第三世界」不無刻板印象之嫌。這種複雜的歷史經驗與當下文學研究中理論運用的眾聲喧嘩相映成趣，僅看到「想像共

同體」和「公共空間」也有簡約之嫌，如在都市研究中常可看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這位「漫遊者」的身影，既被引為張愛玲的知音，也被視作魯迅的同道。

在今天價值多元、跨語言跨民族文化空間迅捷流通的全球化境遇裏，文學研究中援引外來理論資源已是司空見慣，雖然多少具「挪用」性質，在詮釋上試圖擺脫成見而另闢蹊徑，但是否合乎中國現實卻有高下優劣之分。筆者這裏愈說愈遠，也是因為受到藤井《閱讀史》的啟發而寫下一點感想。

歷史的鐘擺在「革命」與「現代性」的兩端來回，既激起陣陣救亡的巨浪，為建立民族國家的主體前赴後繼，不惜犧牲，同時以都市為中心發展着消費社會和物質文化，也曾有過昔日的輝煌。

朱舜水研究的雙峰

● 楊際開



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錢明：《勝國賓師——朱舜水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